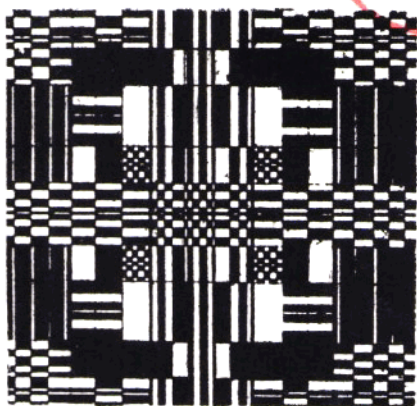


城市史研究



第一辑



天津教育出版社

CHENGSHI SHI

YAN JIU

天津城市科学研究会 合编
天津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研究所



“城市史研究”编辑部

顾 问 王 辉 刘玉麟

编 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 强 王明浩 冯承柏

刘洪奎 沈玉麟 吴恩扬

罗澍伟

主 编 胡光明 刘洪奎

副主编 林纯业 崔志远

目 录

一座筑有城垣的无城垣城市

——天津城市成长的历史透视……………罗澍伟 (1)

天津开埠前城市规划初探……………李 森 (13)

尽快把天津港辟建成自由港区……………唐本政 赵伯乐 (25)

丝绸产销的兴盛与苏州城市的发展……………王 翔 (38)

清代重庆移民、移民社会与城市发展……………王 笛 (58)

世界城市化的历史大势……………于慕英译 (80)

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

…………… [美] G·W施坚雅著 陈 克译 (87)

周学熙与农工银行…………… [日] 浜口允子著 马玉珍译 (133)

附录：通县的开发对天津的影响……………郝庆元 (151)

中国城市史研究论著索引 (二)……………

……………《近代天津城市史》编写组 (157)

一座筑有城垣的无城垣城市

——天津城市成长的历史透视

罗 澍 伟

天津是我国近代发展起来的著名城市，它在近代中国的地位仅仅次于上海，很令世人瞩目。一个在封建时代城市网络中层次不甚高的近畿府城，在开埠后的几十年里，能够脱颖而出，成为北方最大的贸易港口和工商业城市，必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检讨一下天津城市成长的历程，校正和深化我们对天津城市性质的认识，并力求从中得到启发或借鉴，自然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一般说来，城市的起源和发展大致分为两种类型：

一类是计划建造的城市。这类城市多系依统治阶级的需要，有计划地筑成。其建筑风格不但能显示统治者的权威，而且便于治理，并具有防御功能，城垣多为四边形，外掘沟堑，以保持城池的封闭性。这类城市一般缺乏自然活力，在历史上被称为有城垣的城市。

另一类是自然发展的城市。这类城市多因贸易或生产需要发展而成，城址地势平坦，多近河流或交通孔道，运输方便，城市中心为贸易市场。经过长期发展，市区沿河流一侧或两侧作辐射状延伸，市区平面没有固定的形状，没有濠墙、城界，是开放型的。这类城市多具发展的内在动因，在历史上被称为

无城垣的城市。

若用这两种模式考察天津城市的成长，我们会发现，天津更接近于后一种类型。传统的观点认为，由于15世纪初明王朝的设卫筑城，天津因而得名，天津城市也从这时开始形成。其实这是把城垣的修筑和城市的形成等同起来了。天津作为一个具有多种职能的城市，至迟在元代即已形成。卫城的修建等非经济因素固然对天津城市成长带来了影响，但天津城市的成长始终没有受到卫城的制约，而是沿着经济最活跃的河岸地区自然延伸。开埠前如此，开埠后依然如此。天津在近代迅速崛起的根本原因，也是旧城市蕴藏的潜在优势的火花，燃起了新城市的成长之火。尽管从明代起，天津一直佩带着城垣的项链，实际上却是一座筑有城垣的无城垣城市。

—

天津所以能够产生和发展，从城市地理学的角度观察，首先应当归结于它所处的河海冲要的优越位置。而这种优越位置的形成，可上溯到3—8世纪的汉唐时期。

据《三国志·魏武帝纪》，公元206年（建安十二年）曹操为了征讨单于蹋顿，“凿渠，自呼拖入泲水，名平虏渠；又从洵河口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①“集解本”《董昭传》引谢锺英云：“平虏渠在今天津府沧州南，首起饶阳，东至沧州。泉州渠首起今顺天府武清县南，东北迳宝坻，北入洵河。”^②这个解释，大致不差。又据《水经注》卷十四“濡水”条，曹操与此同时还开凿了一条西与泉州渠北端相衔接、东至

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8页。

②中华书局缩印本，第399页。

濡水的新河运渠。^①这样，载有大批军事物资的船只，便可由今河北省中部地区各河进入平虏渠，转入泲水，再由泲水入泉州渠、新河，经濡水到达河北北部山区。当时天津平原的海岸线尚在泉州渠南端附近，出入海口十分方便。所以随着平虏渠与泉州渠的开凿，处于中转地位的泲水，开始成为河海运输的要冲之地。

天津地区的这种地位，到了唐代更趋明显。这在一方面是因为隋朝开始沟通了贯穿中国南北的大运河，而运河北端的永济渠正是旧日平虏渠的南向延长。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由贞观年间开始，唐朝为了解决河北北部防军的军需供应，需要把大批粮帛从江南地区通过海路，运至今渤海湾西岸北部，入鲍邱水。然而在入鲍邱之前，行船需经一段险滩。为此，沧州刺史姜师度在公元706年（神龙三年）大致沿曹操所开泉州渠重开一渠，亦名平虏。这样大批运船到达渤海湾西岸附近不再北驶，而是入泲河口，经此渠进入鲍邱水，从而减少了海难的发生。此事见于新、旧《唐书》，虽语焉不详，但言之凿凿。天津地区作为河海运输中转基地的地位，因此进一步巩固下来。

由于唐代的这种海运自贞观至天宝持续了100多年，天津区的重要地位逐渐为社会所重视，所以从唐代开始，这一带出现了“三会海口”的名称。据杜佑：《通典》卷187载：“渔阳郡东至北平郡三百里，南至三会海口一百八十里”。渔阳郡是

^①该条云：“濡水自孤竹城……东南流，逕乐安亭南，东与新河故渚合，自雍奴县承鲍丘承东出谓之盐关口。魏太祖征鬲顿，与沟河口俱导也”。所谓“与沟河口俱导”，就是泉州渠相接。见《水经注校》，第474页。

唐代海运的终点，既然与三会海口之间注有方位、计有里程，说明两地间必有密切的联系。所以三会海口之名始见于唐代，并不是偶然的。三会海口的出现也说明天津城市确源于河海冲要的优越位置，源于河海运输的日益发展。从汉唐时代开始，天津城市成长所具有的这个特点，一直持续了一千多年。

二

城市的胚基应是聚落，但并非所有的聚落都能够发展为城市。天津地区的农村聚落，大约在新石器时代便出现了，最初出现在北部地区。到了战国时期，今日天津的东郊和南郊，农村聚落已相当稠密。但是真正做为今日天津城市发展基点的聚落却出现较迟，也就是说，直到13世纪初的金代，天津才进入早期城市阶段。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天津地区没有出现过早期的城市聚落；天津地区早期的城市聚落不在今市区一带，而是在其四周，如西汉时期的泉州、雍奴、东平舒、章武等即是。但这些聚落都是随着天津平原的开发而设立的县治，属于有城垣的政治性城市，即行政中心，并不具备城市成长所需要的经济活力，因此很快就为历史的潮流所吞没。只有今日的军粮城，因当时处于海口和泉州渠交汇的地方，且有渔盐之利，因而得以初步发展。有人认为军粮城就是魏晋时的漂榆邑（角飞城），唐代的三会海口；而且这里还出现过“民咸煮海水，藉盐为业”^①的盛况。如果这些说法成立，那么我们可以把军粮城看成是天津城市成长过程中，对城址的第一选择。

然而，军粮城何以没有成为天津城市成长的基点？我以

^①《水经注校》卷九第235页。

为，除了地理环境变迁的因素影响外^①，还与唐五代以后中国城市群体向南发展，而政治重心却向北转移的形势变化，有密切关系。

原来到了宋代，天津地区成为宋辽南北对峙的前沿阵地，海河被称为界河。为了阻止辽兵南下，宋军沿界河南岸设置了许多名叫寨、铺的军事据点。宋朝对驻军采用了屯戍的办法，即边守卫，边耕种。结果在无形中促进了天津地区的农业开发。

辽朝虽兴起于辽河上游，但在取得燕云十六州之后，立即把幽州建为陪都，称南京（燕京），在辽朝设立的五京中规模最大。

辽本为游牧民族，所产金、银、羊、马、橐驼之属为宋所必需，且占有煮盐之利。宋是高度发展的农业社会，商业手工业发达，物质生活水平高，缁帛、漆器、茶叶、香料、稻糯和书籍等，对辽人具有足够的吸引力。南北贸易，势在必行。最初宋在易、雄、霸、沧诸州设置榷务，年可获利税10万缗。后因战争关系，将边境贸易停止，但商人走私却因此大盛。尤其是大批廉价的北盐，由海口入界河，沿途销售，边吏因循，不能禁止。南北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结果，又使天津地区成为最合适的经济交流窗口和贸易集散地。

金灭辽后，索性迁都于燕京，并改名中都。当时的北京地区在历史的积淀中，已发展成为联系中原、东北和蒙古草原的交通枢纽，而来自这三大地区的不同民族，又先后以北京为中心统治了全国。^②做为首都，北京也有其不足之处。一是周围

^①由于黄河在1048年（庆历八年）改道北流，所造成的巨大冲积扇使军粮城远离了海口。

^②参看唐晓峰：《历史地理学在城市问题研究中的作用》，载《城市问题丛刊》第三辑。

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无法供养一大批不直接从事生产的城居人口；二是作为内陆城市缺乏天然的港口。天津地区是距北京最近的河海通津之地，不但可成为北京的出海口，而且是南漕北转的理想枢纽和储备基地。据《金史·河渠志》载，金朝建都北京后，“山东、河北之粟……皆合于信安海隅，泝流而至通州，……十余日后至于京师。”^①所谓“合于信安海隅”，就是让漕舰先在“信安”附近有大片平地的河岸旁集中，然后上溯北运河，经通州到达北京，如果从当日海河上游的地理环境以及日后元代漕船大批集中于三岔河口的情况来考虑，信安海隅似即在三岔河口一带。因为只有这一带最适合大量船只的停泊中转。大约在1216年（贞佑二年）前不久，为了加强这一重要地区的防卫，又在这里设置了直沽寨，派兵将戍守。

元代是天津城市成长过程中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元代的大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②因此只得通过河运或海运，把大批漕粮及其它物资转送到大都。然而无论河运还是海运，漕船在进入北运河前，都要集中到南北运河与海河交汇处的三岔河口以下。大批漕船的到来，极大地促进了天津城市的形成与发展。明代天津道兵备副使胡文璧在追述这种状况时说：“元统四海，东南贡赋集刘家港，自海道上直沽，达燕都，舟车攸会，聚落始繁。有宫观，有接运厅，有临清万户府。……北为仓上，为南仓，为北仓，元朝储积之地”。^③此外，元朝还派兵在直沽屯种戍守，并设置了海津镇。“海津”一词的出现，

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682页。

②《元史·食货志》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364页。

③《求志旧书》。

反映了元朝对天津所处海滨津要地位的认识。随着大批运船的频繁来往和附近居民的生活需要，商业贸易也开始兴盛起来。元人张翥诗说：“一日粮船到直沽，吴粟越布满街衢”。天津做为地区性集散市场，应即在这时出现，三岔河口以下的海河西岸开始成为热闹的市区。这样，海河岸边的直沽便成为一座兼有交通、仓储、行政、宗教、军事、屯垦、商业等多种功能的首都卫星城。

三

鉴于直沽在交通和军事上的特殊地位，明王朝于永乐二年（1404年）在这里设立了天津卫，第二年又修筑了卫城。明代的漕粮虽改为河运，但规模比元代大，不但在直沽建立了更多的仓廩，而且设立了户部分司，主管仓储收放。为了稳定漕船运军的生活，明王朝于成化年间规定，漕船往来可免税携带一定数量的南北土特产品，这样运河在实际上又成为南北物资交流的通道。史载，直沽在永乐时已为商贩所聚之处，到正德时更加繁盛，“天下粮艘、商船鱼贯而进，殆无虚日”。^①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用品，诸如鱼盐螺蛤，絮帛粟稻，曲纸板木，薪菜酱醢之属，更是源源来到直沽集散，不少行商因而变为坐贾，这时的直沽已成为运河北端的著名商业城市。但在城市平面上，中心市区依然和元代一样，是沿海河西岸上下延伸，在这片区域里“百货交集”，“商贾辐辏，骈填逼侧”，“素封巨室，率萃河干”，而做为统治中心的卫城，除了军政衙署外，“屋瓦萧条，或为蒿莱”；^②城内四角，尚为四个大水

①吕盛：《天津三卫志跋》。

②毕自严：《督饷疏草》卷四。

注。弘治年间，先后在城内外设立了十个集市，五个设在城内的不见发达，而在城外沿河地区的集市却日益兴旺。^①这些都反映出天津当时虽筑有城垣，却具有明显的无城垣城市的经济发展特色。

清初，天津卫改为天津州，旋又置府设县，从此天津做为一座封建城市的名字，正式取代了直沽。康熙时，将钞关（常关）由京津间的河西务，移至天津北门外的南运河岸（即北大关）。驶到天津的运河商船和闽粤海船都要先来这里停泊，等待验关。这里遂因此成为南北商货的装卸码头，各种专业性的街道和市场也就近在北门外大街东侧纷纷出现。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这里和东门外的宫南、宫北大街联成一片，“房屋林立，相连数里”，成为天津的繁华区和商业中心。随着天津城市的繁荣，海河东岸也得到发展。雍正时长芦盐的电储处移到河东，使河东地区成为一望无际的“盐坨”。乾隆时又解粮禁，辽东粮豆从海上大批运到天津，河东的粮店业也兴盛起来。而城垣之内，依然是官署、学宫的所在地和居民区，日常生活供应完全依赖城外的商业服务区。所谓“民无宿粮，地无井泉，每日水米均恃城外接济，所有富商大贾，百货居集，均在城外”。^②正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至此，天津的城垣完全成为一个象征性的饰物。从元到清，天津城市中心一直沿河发展，而不具备有城垣城市的那种封闭性特色。所以在第二次鸦片

^①参看张仲：《天津市区的历史变迁》，《天津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2期。

^②《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729页。又据谈迁：《北游录》，顺治时，天津即是“城中不见井，俱外汲于河”。由此可见明代亦如此。

片战争期间，“偏安一隅”的旧天津城垣无法起到保卫城市的作用。清军不得不在城外，依势增筑一道濠墙。

四

天津辟为通商口岸后，在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压迫下，城市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呈现出明显的异化现象；但与此同时，伴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进入，天津城市的成长却如鱼得水，很快发展成北方最大、最繁忙的商埠，和进出口商品的分配中心地。

从1860年（咸丰十年）到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先后有九个国家在天津设立租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租界为取得自身的发展，不但相互毗连，而且无不是依海河的走向来划定，也就是从天津城北东半部的传统繁华区以下，向海河下游方向伸展，完全脱离了与天津城垣的联系。由于海河上游水深河阔，各国租界均沿上游两岸修建了良好的停船码头，这就为租界发展成天津港口的航运中心创造了条件，并在此基础上繁荣起来。外国商人开设的洋行，最初仍设在东门外的宫南、宫北大街一带；但随着租界的发展，洋行纷纷迁入租界，使租界逐渐取得了天津经济中心的地位。

根据《辛丑条约》的规定，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天津城垣被强行拆除。如果从不平等条约的角度看，这无疑是损害民族自决权的一种屈辱；但若从天津城市成长的角度看，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因为五百年来，天津城垣除了做为封建堡垒外，并没有对天津城市的成长起到明显的积极作用。城垣的拆除，改变了以往天津市区发展中那种不协调状态，消除了城区间的隔阂，方便了市内交通，使天津真正成为一座无城垣的开放型城市。此外，由于当时天津城市地位的不断提高，城垣的

拆除还对国内其它城市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比如上海地方士绅见天津城垣拆除后，四城修筑马路，交通便利，于是联名具呈上海道，要求效法天津，拆除上海城垣。但当时的两江总督周馥碍于体制，未敢贸然批准此项动议。这件事一直拖到辛亥革命后，才获准实施。

城市发展的自然形态，往往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义和团运动后，天津旧市区以外那些适宜发展的沿河地带，均为帝国主义瓜分净尽，所以从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开始，直隶总督袁世凯出于统治需要，不得不筹建三岔河北岸以北的河北地区，规划建设了经纬交叉的道路，以及官署、学校、民宅、工厂和商店，特别是拓建的大经路（今中山路），设计标准超过租界，是当时天津最宽的马路。与此同时，又在大经路的北端，辟火车新站（北站），并将京奉、京浦两路局移设于此。市区平面向北扩展后，很快成为直隶省和天津市的政治中心、教育中心。但由于河北地区离海河较远，天津的市区中心并没有因河北新建区的出现而有所转移，即仍然保持在传统的北门外以东和东门外以北的沿河一带，始终移不到河北来。

随着天津城市经济的发展和租界区的繁荣，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天津已成为一个沿海河走向自然发展的工商业和港口贸易城市，整个城市夹河而立，东西狭，南北长，主要街道均与海河平行或垂直；城市分东西两部分，依靠桥梁和渡口相联结。城市的中心区，也因租界的向南扩展，移到了法租界的劝业场一带，开始奠定了日后天津城市成长的基本格局。

最后，还有一点应当提及。天津虽然是经过长期发展的北方著名滨海城市，但港口并不直接靠海。这从历史上考察，除因海河上游衔接南运、子牙二河，便于船、货的集散与输转外，当时的船只一般吨位较小，吃水较浅，在河口以内停泊安

全，装卸方便，自然也是一个方面。到了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加强，市区内港的吞吐能力已不能适应需要。于是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在距天津最近的海口地区塘沽修建人工港码头——新港。从此天津又开始沿河向海湾地区发展，很快新港便成为天津城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直至后来完全取代了市区内的沿河港口码头。这种扩展与更替无疑是适应天津城市发展的自然需要的，因而具有生命力。

小 结

通过以上的粗浅分析，我们可以从天津城市成长的过程中，总结出哪些值得思考的问题呢？我以为大致应有如下几个方面：

1. 天津城市所以能够出生和发展，是与其所处的河海冲要的优越地理位置分不开的。这种冲要地位的形成，既靠自然条件，也有人为的因素（如运渠的开凿），并由此决定了天津城市的基本特点，即天津首先是一座依河傍海，“路通七省舟车”的水旱码头。

2. 天津城市的出现，是经过千百年的历史选择与淘汰的。在这个过程中，天津地区先后出现过许多城市聚落，有的只留下了名称，至今不能辨其确切方位，诸如漂榆邑、三会海口、信安海墻、直沽寨、小直沽、海津镇皆是。但在广义上，不妨均视为今日天津的前身。

3. 由于天津城市的出现系因自然需要，本质上应是一座无城垣的城市。明初虽在其旁修筑了卫城，但只具有军事和行政职能；到了清代，天津城垣也只是州、府、县、道、镇的治所和民宅，城垣既没有成为天津城市成长的基点，也不具备发展为中心市区的条件。种种非经济的因素的存在，亦未能扭转天

津城市的发展方向。^①

4. 因为天津具有适宜集散贸易发展的优越地位和便利条件，所以中心市区始终离不开海河。近代以来，天津的城市性质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不能改变沿河发展的总趋势，同世界上许多沿河城市一样，天津城市也是蜿蜒曲折地夹河而立。

5. 随着天津城市的发展和海河自身条件的限制，地处市区的河港码头最终移向海口的人工港区。因有海河干流的联结，港区逐渐构成天津密不可分的部分。这也就是今日天津“一根扁担（指海河）挑两头（指中心市区与滨海市区）”的城市格局的由来。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①直到今日，天津人也不把卫城看做是天津的发源地。1985年重修宫南宫北大街时，题写这里的牌坊匾额为“津门故里”。将这四个字用于此，是很有道理的。

天津开埠前城市规划初探

李 森

城市规划一词在我国大约近代才出现，但属于城市规划这一门类的科学工作却是源远流长。远在奴隶社会的夏代就开始营建城邑；西周时曾经开展过大规模的营城建邑活动，制定了一套城邑建设制度，即：“营国制度”。随着社会的发展，经历几个阶段的演变，到9世纪末10世纪初期，由于市坊规划制度的变革，推动城市规划制度进一步发展，进入了封建社会后期城市规划阶段。天津的兴起较晚，元末明初逐步形成，正是属于后期封建社会城市规划时期。

天津城的前身，远在金时为直沽寨（多数论者认为在直沽三岔河口地段，即今狮子林桥沿河一带），由于金王朝疏通黄河以北运河段，直沽寨逐步成为漕运的中转枢纽，原始聚落有了进一步发展。元至元二十年（1283年）试行海运成功，漕粮运量日增，一年多达350万石。当时南粮北运，是先以海船运至直沽卸存，然后改装河船转运京城（今北京），这样直沽寨就成了海船、河船和驳船中转之地。再加以盐业的兴起，直沽地区日益发展，其地位重要性不断增强，元延祐三年（1314年）改直沽寨为海津镇。元泰定三年（1326年）在海河右岸建起天后宫（俗称娘娘宫，也曾叫西庙，东庙位于大直沽）成为当时船员渔民祭祀活动的中心。随之出现的宫南宫北大街（今古文化街）两侧店铺林立，成为物资交流的闹市。元代诗人张

翥《代祀天妃次直沽》的诗中写道：“晓日三岔口，连樯集万艘。普天均雨露，大海静波涛。入庙灵风肃，焚香瑞气高。使臣三奠华，喜气满宫袍。”记载了当时三岔口的盛况。现虽未查到有关海津镇具体规模的史料记载，但可以看出，直沽寨时以防卫与漕粮转运为职能的聚落点，已发展成为一个有一定规模的城镇了。天津城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规划建设起来的。

明建文元年（1399年）北京的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起兵南下，“自小直沽渡蹕而南”直下沧州，于建文四年（1402年）打下南京夺取了政权，次年改元永乐。由于“圣驾”由直沽渡河南下，因而改直沽为天津。永乐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404年12月23日）在直沽设天津卫；永乐二年十二月九日（1405年1月9日）设天津左卫，同时修建天津城；永乐四年十一月八日（1406年12月18日）设立天津右卫。据《明成祖实录》卷三十二记载：“上以直沽海运商舶往来之冲，宜设军卫，且海口田土膏腴，命调缘海诸军士屯守”。设卫的目的是既能加强防守，又可以屯垦。

天津城选址在三岔河口西南方，东距潞河（海河）二百五十步，北距卫河（南运河）二百步，筑城浚池。初建为土城，城垣九里十三步，高三丈五尺，广二丈五尺，四面开门，上建城楼。城东西长，南北短，成矩形城池，方位为南北向，由工部尚书黄福、平江伯陈瑄受命修筑。明弘治六、七年（1493—1494年）按察副使刘福主持重修改为砖石包砌。四门名称分别为“镇东”、“定南”、“安西”、“拱北”。此后由于种种原因重修十二次之多，其中康熙十三年（1674年）重修时在城东南隅修石闸，引海河潮水入城壕，四门改为“东运沧海”、“南达江淮”、“西引太行”、“北拱神京”，四角俱有城楼。清雍正三年（1725年）城壕皆坏，由盐商安尚义、安岐父